

陈澧《东塾著稿》考评

于乃义 李孝友

云南省图书馆善本书库收存有《东塾著稿》一百五十册。清陈澧撰。原系竹纸散页、无行格的写本，全书有朱墨批改。经过衬纸装订为整齐的巾箱本，书根题“东塾著稿”，应是装修者所拟题，即据以为书名。根据本书的内证，博采有关文献，详细参阅，审知此书为陈氏手稿。全书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摘录古笈，但并非按照原书章节照抄，而是提出某些专题，再就多种书中有涉及这些问题的选录片言只语，也有大段篇页相参伍，汇集一处，作为考校这些问题的素材。另一部分是读书时发挥思想见解的议论，不拘体裁的笔记。以上两部分都经作者分册分段拟订标题，刻章钤印于书前。通读全书，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我们取陈氏已经刻印流传的其它著述相比对，发现有少量取材于这部原始札记，但为数不多，绝大部分未见引述流传。

在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会议上，云南省图书馆曾汇报发现这部书及其内容梗概，引起与会专家和同志们的重视。此书经鉴定和核阅，决定编入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

这一部巨型稿本的发现，不但提供研究陈澧的学术成就以较详的资料，并反映陈氏思想的演变，体现我国鸦片战争后知识分子的革新思想，为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学术思想突破清代文网，清

除障碍，开辟先路。由于以往陈氏著述，仅限于已刻印部分，传世不多，难窥全貌，因此我们就这部《著稿》编入善本书目之便，进行初步整理，并取陈氏已往刻印并可访到的各种著述相对证，分析探讨。本文试就以下六方面进行初步的考证与评价：

- (一) 陈氏生平及此稿本的流传经过，与鉴定为手稿之依据；
- (二) 陈氏与“学海堂”及“菊坡精舍”；
- (三) 此部《著稿》与陈氏其它版本和传抄本的比较；
- (四) 从《著稿》和有关文献了解陈氏后期的著述旨趣；
- (五) 《著稿》体现陈氏治学方法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
- (六) 进一步整理印行《东塾著稿》的设想。

一

陈澧，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光绪八年（1810—1882），享年七十三岁。九岁即能为诗文，十七岁肄业龙华书院（后改名粤秀书院），山长为嘉兴人陈钟麟（字厚甫、号范川，曾纂辑《全唐文纪事》为有名学者）^①，澧执弟子礼，从学甚勤。道光十二年（1832）考取举人，此后六应会试不中。曾选任广东惠州府河源县训导，到任两月即告病归。随又拣选知县，不愿出仕，从此脱离官场，以“国子监学录”名义回家乡治学教书，任过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担任菊坡精舍山长^②。

陈澧的著作和这部《著稿》是咸丰七年（1857年陈氏年48岁）开始直至逝世一年前的作品。他生活在鸦片战争广东两次被外敌侵

^①参见《东塾集》卷三《陈范川先生诗集后序》。

^②陈氏传记详见《东塾读书记》自述，《清史列传》卷六十九，《东塾集》卷首《国史儒林传采进稿》，以及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七等。

略破坏的时代，此时他虽是离开宦途的书生，仍受严重冲击，这对于陈氏学术思想影响甚大，在他的《著稿》和其它著述里反映出来。

陈澧手稿是怎样传入云南的？辛亥革命后，西南军阀混战，云南军阀曾以“靖国军”的名义，派遣部队进入广东长期盘踞。有一个昆明人廖行超（号品卓）曾留学法国学军事，当时担任“靖国军”的参谋长，大约在1925年前后，购得这一部已装修的《东塾著稿》带回昆明。廖氏喜爱藏书，得此书视为珍秘，从不以示人。1952年，此书经廖氏售给昆明书商陈松年经营的寿松堂，云南省图书馆及时收购来馆，全部保存完好。

由于此书未编卷次、册次，也没有总目，全书150册不易清理。但每页的封面，有作者亲题，总称“学思录”或“学思稿”、“读书记”，也按本册内容标明子目。但要把全部书连串起来，重新排列次序是有困难的。按照《东塾读书记》的体例，陈氏标榜郑康成《六艺论》的旨趣，“作孝经以总会之”，认为“六艺之总会，此微言未绝、大义未乖者矣”；^①其编次与《著稿》歧出。《读书记》是陈氏逝世后由其门人廖廷相校刻的，如果依据此书，把《著稿》各册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反而失去原著真像。几经研讨，我们仍旧尊重《著稿》自身的体系，按全稿内容分两大段落，已如上段介绍。现将“读书摘要”列于前，大约占全稿四分之三强；“随感笔记”列于后，占四分之一弱。后一部分有分专题的，如“天文、地理、论文、论史”等，也有“通论、默记、琐记”等。有一册题名“杂论学术”，但卷端冠以“学思录序”、“读书记序”及“东塾读书记序”等篇，所谓“杂论学术”，也是作者写“学思录”或“读书记”的设想、规划和拟目，还有若干条属于凡例性质，我们以此二册列全书之首。

鉴于此书系稿本，现先将我们暂编《东塾著稿》的总目、册

^①《东塾读书记》卷一。

次，编写简目，可参阅本书附录一。

陈氏这部手稿，是他生平著作的备料总汇，铃有“陈”、“濠堂藏书”篆文印章，及宋体字的“东塾记”、“学思录”等朱印或墨印，铃盖在每册和许多页内。又内封面毛订散页各册，也经作者题写“篇名”，笔迹与内容是一致的。仅在第128册以前有少数是别人甚至是童稚所钞写，还有陈氏为其子宗谊亲笔篆书两个砚章，并有墨书跋文，可证明此书之为陈氏稿本。

二

陈澧考进士未中式，后来选任卑官也告辞。他坦率地表白生平抱负说：

澧亦非不欲出者……愿得县令或有益一方。及屡试不中，大挑又不得县令而得教官，然亦未尝不乐，以为不能治民犹可以教士；……及选授河源训导，则盗贼遍地不可以一朝居，而当事者不问，遂告病而归，未几，河源令遂为贼捉去矣。是年复北上会试……而又不中，至是，乃始有不出之意也。①

以上事实是陈澧生平的转折点。正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军，给他很大震动，在此前后两次鸦片战争广州首当其冲，陈氏全家和广东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涯，才迫使他决心脱离仕途，回到早年读书的粤秀书院。而这个书院的前身即前两广总督阮元于道光四年（1824年）所建的学海堂。原来广东的书院有一个例规，定期为生员讲课，但所培训的都是为考科举学八股文之用，学海堂建成，改变了以往讲授八股制艺，而代之以经史子集诗文，每年定期若干次考试举贡生员，延聘学长命题评选编刻《学海堂

①《东塾集》卷四“与黄理匡书”。

集》。第一集十六卷，署名“吴兰修编校监刻”，阮元也带头写有关考据义理的文章，编入集内。有关学海堂建造的碑记，附录卷尾。这是阮元以往在浙江建“诂经精舍”，倡导古典文史之学以后在广东的推广。阮元在广东任职十年，颇有余暇，以学海堂为活动的中心，延揽许多名士担任学长，提倡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以来为笼络士大夫以孔孟之道和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也涉及到天文、地理、历算等学科作为多种专题，等于变相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汉学。”

阮元在广东还有重要的贡献。当时外洋已开始输入鸦片，他早于林则徐即认识其毒害，既采取抵制的措施，并网罗军事人才。有一个浙江人张杓（号磬泉），迁居广东为粤秀生员，此人学识精深，并研习兵法。阮元聘他做家庭教师，又举他任学海堂学长。张杓既参与编校《皇清经解》、《学海堂集》，又“上书言击英夷事”并作《平夷四策》，为诸方传诵，有重大影响。对后辈的陈澧，可算是“导夫先路”，为此，陈氏曾写长篇文章，衷心的赞仰。^①

陈澧的年岁小于阮元四十四岁，他曾以举人身份参加过阮元主持的考试，文章被编录于《学海堂二集》^②，阮元离广东后，继任的卢仪吉是阮的学生，发挥阮元未竟的事业^③，陈澧进入学海堂任学长是何年开始，虽无明文记述，但他直接间接受到阮元、卢仪吉的启发教育是事实。咸丰九年己未（1859）张维屏主编《学海堂三集》二十四卷，收录陈澧作品多篇，他进入学海堂当在此时以前。其后，金锡龄于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编《学海堂四集》

①《东塾集》卷五第四至九页“张磬泉先生传”。

②《学海堂二集》卷三“騷牝三千解”及卷七“春秋刘光伯规杜辨”。卷九“书江良庭征君六书说后”、“卷十六”素馨灯赋”等文，与阮元之作并列。

③《东塾集》卷二“离经辨志斋记”。

二十八卷，序言里说明“督抚学使每年季课，考校如归。岁月既久，卷帙遂多。陈兰甫先生选为四集，未成而没，锡龄等编成之。”盖陈氏逝世四年后始刻成，而陈氏选编此书，应在改任菊坡精舍山长时所为。

按《著稿》批清咸丰七年（1857）始作“学思录”，而《汉儒通义》也同时刻成。此时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极残暴地屠杀平英团等二、三十万人之后，广州被英法侵略军占领，陈澧避居横沙村舍时期，这是他担任学海堂山长的后期。回溯陈氏更早些时的著作，如《切韵考》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时年三十三岁；《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成书于道光廿八年（1848），时年三十九岁；这两书应是他担任学长时的著作，谨守汉学家法度，而陈氏“至老为菊坡精舍山长”^①则是晚年（可能在六十岁前后）的事。

菊坡精舍的建立，陈氏有文详记其始末^②。当时广东巡抚蒋香泉、布政使方子箴就粤秀山的道观“长春仙馆遭夷乱废圮”而重建，聘陈氏掌教。其所以不名之曰“书院”而题名“精舍”，正由于陈氏深恶旧书院专课时文。“此当别为课，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标之前轩。”^③——可见陈澧在学海堂时，学长之上还有山长，不能贯彻他的主张，此时主持精舍以终其身，正是他撰写“学思录”（后改名“东塾读书记”）完成这份一百五十册（或还有缺失）的《东塾著稿》所标榜的师法顾炎武，开创新风气的据点。

《著稿》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篇页都属陈氏手稿但也有不同的笔迹，其中几件值得考查：

①《清史》列传卷六十九。

②③《东塾集》卷二第二十九页。

一是一小部分抄稿(不是后半的笔记)明显地为另一人所抄,甚至还有像幼孩的笔墨。但这些抄件,都经过作者校改和批点。我们从《著稿》的内容已证明一部分是他的长子陈宗谊所抄。《著稿》第二册有准备刻于石砚的篆书《论语》《孟子》首章的两句话,还有题识原文是“告宗谊:吾不敢望尔读万卷书,但望尔读论语孟子,且但望尔读论语第一句、孟子第一句,九字而已,便是士人。若天下士人皆诵行此二句,则天下太平矣。今以二砚屏各刻此九字一置吾室中,一以畀尔,日日读之。呜乎,勉之哉!”正是这个陈宗谊。他还著过一部《考正德清胡氏禹贡图》刻在陈氏《东塾丛书》之末,可惜年只二十一岁下世。陈澧痛惜此子,曾写过“长子宗谊墓碣铭”^①提到他父子在英法炮火丛集寓横沙村时吐血而不废学习,宗谊能继承发扬其父的义理经世致用之学,“墓碣”引张南山挽辞,比于“颜子”,而谭莹认为宗谊之死是“广东无福”,陈澧认为如天假之年,此子超越在他之上。宗谊死后一年,陈氏又作“亡儿期年祭文”,明白记述“读书考古,每有所得,益复伤心,恨不得呼汝而告之。所著《学思录》,采取诸书,多汝所钞,不能不看,看则伤心。《切韵》、《声律》诸书,多汝所写,不能不校阅,校阅则又伤心。其伤心之甚者,《朱子语类日抄》,因汝所抄而增损之也,今此编已刻成矣,而汝不及见矣。汝读《论语》日记之语,写成一帙,将来附我所著书后,我书传世,与汝俱传,幸也;我书不传则汝与我同归湮没,亦可不恨也”^②陈宗谊为其父得力助手,代抄一部分《著稿》,可为确证。

此外,陈澧的次子陈宗侃,也能继承家学,为学海堂生员之一。写过考证《孝经》的文章,正是《东塾读书记》的开宗明义^③,本于郑玄《六艺论》之绪余,以孝经为六艺之总会,这是陈澧早时

^{①②}《东塾集》卷六。

^③《学海堂四集》卷十六陈宗侃“汉制使天下诵孝经论”,又卷十一“告朔考”。

期囿于汉学的见解，可能为生员及其子一再讲论。宗侃曾否代抄《著稿》，无明确记载，但也是其父的助手之一。

陈澧这部著作，不但有子女之助，更重要的是经常与在广州的友好学生讨论，乃至远在外地未见过面的“私淑”弟子，也通过信件多番谈议。

最值得纪念的是他的学生长沙人胡伯蓊，因伯蓊之父胡湘曾任广东候补知县，陈澧为了生计，应胡湘之约为其二子（同寿、伯蓊）任家庭教师，后以胡湘逝世，其子归葬长沙。当咸丰七年（1857）夷寇陷广东省城时，伯蓊还到危城之外叩访其师于横沙村留连数月。随返湖南，陈澧曾写信与伯蓊讨论“学思录”，披肝沥胆，道出明白的主张（下文评述陈氏学术思想贡献，有详细引证可参阅），引起胡伯蓊的共鸣。原来胡氏也是生活窘迫，已应湖南修志馆之约担任分纂，可得厚酬，他宁愿辞去修志事，即日起程来广州再从师学。亲友挽留不住，冒着暴风雨起程，忽然失踪了，湘人沿途访寻，才发现已溺死水滨，渔人说：“前日大风雨，有行岸上堕水死者，已经埋葬岸边，”打开来看，正是胡伯蓊的遗体。陈澧对这一位以身殉学的友生，伤心极了。撰写了沉痛的“墓志铭”，文里还提到“余之门人虞子馨早死，赵子韶中年悲郁而死，伯蓊且不得其死，皆特出之士也，而伯蓊尤可痛矣！”^①

陈澧与门弟子的讨论函件，不胜枚举。如刘叔俛、黄理厓、黎震伯^②等皆曾致函反复申说（详见第四节）。有一个素未谋面、自称“私淑弟子”的娄江人王宗悚，他从远道“获东塾之类稿、开北窗以盥诵”。^③说明陈澧著述在当时已广泛传诵，他的助手大有人在。而作者的虚怀若谷、集思广益的精神，值得称道。

^①《东塾集》卷六。

^②同上卷四。

^③同上卷四。

三

从上段引述王宗悚和陈澧的通信，可知陈氏的《学思稿》和身后刻印的一部分《东塾读书记》当时已有传抄本流传广东及外省，至于他的著述已刻印的《东塾丛书》（包括《汉儒通义》七卷、《声律通考》十卷、《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附其子陈宗谊《考正德清胡氏禹贡图》一卷）和四种单刻本——《东塾读书记》十五卷又卷十四（东汉）的另刻本一卷与《东塾集》六卷、《申范》一卷、还有仅见记述的其它著作如《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水道考》二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声律谱》一卷、《摹印述》一卷、《忆江南馆词》以及《朱子语类日钞》各若干卷，方面较广，如果逐一分析内容和这部《著稿》一百五十册相比对，将有待于进一步作专题研究。这里仅就两项与《著稿》有关的问题，作简要的考述。

一件是这部《著稿》与陈氏其它刻印过的著述尤其是《东塾读书记》的关系。《著稿》有那些部分已经发表过？我们曾作过初步的核对。

《东塾读书记》卷一至九及卷十一、十二是采取了《著稿》第三至十二册《易》、《书》、《诗》、《三礼》、《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和第二百零四至第二百零九册“诸子”作蓝本写成的。又《读书记》卷十五“郑学”及陈氏专著《汉儒通义》的一些条文，引述了《著稿》第八十册及百一零至百一一册。还有《读书记》卷二十一“朱子”与《著稿》九十三卷“宋儒”，都是根据其子陈宗谊所起草的《朱子语类日钞》增损而成的。《读书记》卷十四单行本“东汉”，取材于《著稿》十七册的

“读后汉记”。——以上是相同部分。

《东塾读书记》卷十二“春秋三传”，卷十六“三国”，《著稿》未见专题资料，可能是我馆收藏者有缺略。反之，《著稿》的其它部分也是最多的部分如“晋至隋诸史、唐书、宋史以及诸经诸儒通论、论史、唐疏、宋明儒、九流、世说新语、楚辞、陶集和各家文集”，尤其是后半部笔记，均未发表过，乃至已定稿的《东塾读书记序》也是第一次发现的。《著稿》之可贵，于此可见。

另有一事应着重提出者，即一九三一年间，前岭南大学图书馆通过杨寿昌、容肇祖教授的介绍，访得东莞邓氏家藏陈兰甫遗稿抄本六百余小册，征得岭大校长钟荣光同意，购入岭大图书馆。随经岭大陈受颐教授选录了这部抄稿的一部分题曰《陈兰甫先生遗稿》载入《岭大学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但不久陈寿颐应聘赴北京大学，离开广州，随即由杨寿昌继续整理选录发表于该刊第三期。比对之下，陈受颐所录者与云南馆藏稿本的“默记”、“学思日记”、“学思录系目”、“杂论学术”各节内容全同。而杨寿昌所选编者，自订体例，分为二十三个章节，即1. 求微言大义；2. 求有用；3. 以义理为归宿；4. 学问须反约穷源；5. 读书须贯彻首尾；6. 重义理不废考据；7. 会通汉宋；8. 变化气质方能变化风俗；9. 为学须不囿于风气；10. 四科之义；11. 学问繁碎之弊；12. 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13. 学问不可自认为满足；14. 学问宜有宗主有不同；15. 汉宋学经说之失及著书谨严之体；16. 读书注重玩味力行；17. 经学注学疏学碎义学；18. 学问勿强通其所不可通；19. 著书宜使人易知；20. 辩驳古人之法；21. 工艺实业之宜注意；22. 读书著书之心；23. 欲著之书留待后人。这二十三节，不但有标题，并有杨寿昌的注解及按语，但此后即未继续发表。

从上述前岭南大学所得的“陈兰甫遗稿抄本六百余小册”，在《岭南学报》两次发表了一部分，可窥见其内容之一斑。陈受颐所录出的，完全是陈澧写作的本来面目；而杨寿昌所选录的，内容虽较广泛，却是杨氏就其本人体会的意见编排的。陈、杨两氏编录的体例不同，而我们今天未能见到前岭大收藏，这两份摘录发表的内容，提供我们与云南馆藏《著稿》比较研究的有益资料。

首先应探究一个问题，即岭南抄本有六百余小册，而云南收藏的稿本只有一百五十册，此两本的数量比较，似乎岭南本多出四百余册，使人怀疑云南本尚有缺略，有待取两本比对。原岭南大学可能已并入广东中山大学，经过这两年编订全国善本书，也曾在广东开过讨论交流会议，均未见报导这部抄本六百余小册的情况，究竟此部巨帙抄本现存何处？有待于访查。原收藏者“东莞邓氏”是谁？又陈受颐、杨寿昌、容肇祖教授，如能访问请益，可能探求踪迹。现在我们先提出初步的推测意见：

（一）岭南本与云南本虽数量悬殊，但云南本原是散页多册合订的比较厚的本子，岭南本称为“小册”不能仅就数量比较。

（二）云南本有朱墨批校及分年分册的编录记述，已证实是陈澧原稿；岭南本也明白记述是“抄本小册”；再根据陈澧自批开始写“学思录”是咸丰七年（1857）至他逝世前一年即光绪六年（1880），年代是衔接的，中间缺略数年，其中同治十年（1871）陈氏年六十二岁，由于大病而停笔，其它缺略的几年，可能是云南本缺失的部分。

（三）陈受颐著录的“默记”等篇，与云南本字句全同；杨寿昌选辑各条，也分别见于云南本，仅被删节和移动次序，证明岭南抄本可能根据云南的《著稿》传抄。

以上仅属片面的推测。要明瞭岭南本的真像，只有期望见到

实物，才可能作出确切判断。

四

为了提供读者对《东塾著稿》作较深入的了解，根据此书封面及扉页所批注的朱墨题识和年代以及陈氏写作时年龄与有关的几件事，试列为简表（参见本文附录二）。

这部《著稿》，除经著者批注了年代及标题而外，还钤盖着“学思录”、“学思稿”、“读书记”、“东塾记”以及一些专题的印章，乃至后半部分发挥的议论，如“通论”、“默记”、“学思自记”、“论学”等，可能写在散页上，积累既多加以整理，按性质分订成册。这样新颖的笔记，对我们今天做文献资料工作有所启发。

上文曾就陈澧早年刻印所著《切韵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等体现出当时是谨守汉学家法的特点，与他着手写《学思录》以后的不同风格作过比较。总的看来，《东塾著稿》是他企图对祖国文化遗产作较全面的了解，因此有完整的规划，从抄录各书以及发挥见解，都生动活泼，没有八股气氛，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的。他说：

予之学，但能抄书而已；其精者为《汉儒通义》，其博者（非今人所谓博）为《学思录》；其切挚者为《默记》，不复著书也。①

又说：

《学思录》只论学术，然政事亦兼有之。君德、相业、六曹、侍从、台谏、封疆、郡县、学校、营伍以及民俗之弊皆余波及之，无所不有。②

①《著稿》第136册。

②同上第142册。

作者对选抄的书，提出具体要求：

余为《学思录》，凡无当大义者删。因不敢与古人比其渊博，亦无取乎渊博也。且博学非引书多之谓也。①

这段话不仅表达了《著稿》不是泛滥无涯、掉书袋的“博”，而是博访精取。他曾与同道的友人或学生讨论此一问题。如复刘叔俛书：

拙著《东塾类稿》，近年不复刷印者，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著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东塾读书记》。其书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至宋以后，有宋元明学案之书，则皆略之，惟详于朱子之学，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其人之晦者则表彰之，如宋之王万、明之唐伯元。文之晦者则采录之，如《宋文鉴》所选林希书，郑康成传，《广东通志》所采林承芳重刻《十三经注疏序》是也。②

按：此文提到“拙著《东塾类稿》近年不复刷印”，可见在此以前，他的作品不但有抄本流传，还刷印过。但从此时起（即有计划的写《学思录》并改名《东塾读书记》时），即改变旧的体例，停止刷印。说明云南馆藏这部手稿，正是陈氏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时刻的著述。

又与黄理厓书略云：

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慨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惟政治得失未尝身历其事，不欲为空论；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但有栖托之地、陋室可居、脱粟可食，著成此书，生平志业亦粗毕矣。此意自非二三知己，不欲妄以告人。③

又与黎震伯书略云：

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义

①《著稿》第143册。

②《东塾集》卷四第19—20页。

③同上卷四第18页。

理；然则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义理也，若不思其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书，冀有以药此病耳。既成此书，乃著《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于郑若朱子之学，皆力为发明。大约十年，乃可成耳。①

以上引证陈氏函札，说明他的《著稿》不是泛泛的抄书或信笔写出的杂感，而是有思想指导的、有条理的撰作。这还可从《著稿》第一册卷端未发表过的三篇自序中看到。

（一）《学思录序》：

余少时，志欲为诗人文士、文章之士。稍长，为近儒训诂考据之学。三十以后，读宋儒书，因进而求之论语孟子及汉儒之书。年近五十，乃肆力于群经子史文章，稍有所得，著为一书。论语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乃题其书曰《学思录》云。

（二）《读书记序》 （三）《东塾读书记序》。（此两文大同小异，兹录第三序于后，并就第二序有异同者标于脚注）

澧性好读书，于天下事惟知此而已②。读书有所得则记之，有所论则记之。积久成编，其有益于天下之读书者乎？不得而知也。敬慕亭林先生《日知录》，③然此所记惟读书一事，不敢窃比也。有及于读书之外者谓之余记。东塾者，吾家东偏有一书塾，澧数十年读书处也。

按：陈澧手稿原名《学思录》，改名《东塾读书记》，但序文三篇并存，而他逝世后由其门人廖廷相校录付梓的《东塾读书记》十二卷又三卷（目录列有廿五卷，通行本只十五卷，其余九卷注明“未成”，但后来又有卷十四的单刻本“东汉”）均未收入陈氏序言，可能廖氏根据陈澧的另一稿本刻印，未见到此部有序的《东塾著稿》，由此可见《著稿》之重要。

①《东塾集》卷四。

②第二序此处增一句：“所读四部书，最专力者甲部，余则略及焉”

③第二序此处多“顾氏书毕载天下之事”一句。

五

这部《东塾著稿》巨帙，虽然著者一再表示“不敢窃比”于顾炎武，实际他是继承和发扬顾氏学术思想，针对亲身遭逢内忧外侮的感受，想凭借历史学术知识，提出转移风俗、改革政治的主张。由于时代和处境的局限，未能投身于实际行动，只可能发表议论，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影响作用而已。

我们由《著稿》里未发表过的文章，参证他的各种著述。看到著者博取文化遗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下过深刻的功夫，留传关于文史和科技等方面有益的资料，今天还有借鉴作用。由于所探究的面比较广阔，讨论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将分别若干篇另写专文评介。这里仅扼要地简述其主要见解。

一、陈澧虽提出考据义理并重，实际是以考据为手段，达到弄清义理的目的。他重视朱熹，把朱熹之学与郑玄等量齐观，并非践迹于他的前辈或同时的李光地、汤斌、倭仁、唐鉴以及曾国藩等人以“崇宋学、尊朱子”的幌子作为清朝御用的压制知识分子的工。这是陈澧的著书要旨，不论抄书或发挥见解都曾一再强调。如他曾说：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身读诵各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之急宜挽救者也！”^①

陈澧主张读书必须融会贯通，最讨厌觅章摘句、别有企图的所谓“著述”。他说：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

^①《著稿》第142册“学思自记”。

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会贯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朱子谓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凌次仲与焦里堂书云：足下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读者，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此最中近人学问之大病。但能全观礼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作经解耳。”^①

陈澧此段批评，抨击了当时有的号称所谓“汉学、宋学”家为猎取功名，每每“节取一二语”，以装门面的恶劣文风。

二、陈澧治学极景仰顾炎武。如顾著《音学五书》，今天还作为中国语言音韵学的参考要籍；而陈著《切韵考》、《说文声表》以及《著稿》当中有关音韵、反切等节，多发前人未竟之绪。顾氏著重地理学，传留下《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未刻印过的《肇域志》巨著^②，而陈氏著《汉书地理志水道考证》、《水经注提纲》、《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并绘制《广东图》以及《著稿》的地理专节，今天我们研究地理史和有关水利建设问题，还有参考的现实意义。至于顾氏所未涉及而陈澧有深入造诣的是天算、音乐等方面。如陈著《声律通考》、《琴律谱》和散见于《著稿》的有关这一专题的笔记，梁启超评价陈澧，与凌廷堪（次仲）作比较，认为陈氏后胜于前。^③

三、清代末年，南海康有为倡言变法，利用宣传孔门的“春秋公羊学”作思想准备。陈澧早于康氏，虽然没有投身现实的改革行动，但他警惕于当时日趋沉沦的时局，对改革的主张是很坚决的。对广东学界，包括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是有深刻影响的。最明显的如前段提到那位从湖南冒风雨来广州，溺死而不顾的胡伯蓊，正是读到陈氏给他的一封激动心弦的信，迫不及待，奋然

①《著稿》第101册“本朝诸儒”。

②《肇域志》为顾炎武未刊稿，云南省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收存较完整之抄本各一部。云南本四十巨册，我们将另为文介绍。

③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而往的。信的内容是：

仆近年为《学思录》，惟钞撮群书，不成著述之体，欲待二三年后乃编定之。今内度诸身，外度诸世，不可复缓。然且即今为之，犹恐汗青无日，为一生之遗憾，故今以论著之大旨告足下。仆之为此书也以拟《日知录》，足下所素知也。《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学，但论学术而已。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问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今于此书之末，凡时文、试律诗、小楷字皆痛陈其弊。其中发明经训者，如论语之四科，学记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恶乡原，言之尤详，则吾意之所在也。

陈氏此函痛斥人才败坏，虽仅举“时文、试律诗”等为例，其胸怀愤懑可以想见。且提到顾炎武之学重视“博闻”，而清季士大夫，即遁藏在考据博闻的甲壳里。所以说“博闻者固已多矣”，表明学习顾炎武之精神，但矫正时弊，《学思录》不是《日知录》的翻版，从陈氏函中的自白体现出来。

四、陈澧关于“海防”的见解，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同于书生之见。

林则徐的学生魏源，主要参考林氏派人调查情况及翻译外文编成的《四洲志》，并参稽历代史志及其它外著撰写《海国图志》计一百卷，这是当时为抵御外侮，加强海防，受到人们重视的书。张南山（维屏）转赠陈澧，陈氏全部阅读之后，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对原著提出严正的批评意见。他举出魏源的“议政篇”以夷攻夷之说脱离实际。他说：“魏君之为此说，直因廓尔郭一禀而起，遂欲令俄罗斯、米利坚、弗兰西皆助攻英吉利，……此其未喻一也。俄罗斯本非朝贡之国，乾隆中，天威远播，令其缚献阿睦尔撒纳，彼犹为之隐匿，何况今日使受驱策，此其未喻二也。……”可见陈氏对沙俄的正确看法，驳正了“效纵横家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的书生之见的错误。他也不同意魏氏主张“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他认为这是只求速利而忽略了旨在全面防御的海洋水师

建设，他指出临时练水勇是失策的。又魏氏主张“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谓诱人内河，断其出口之路而歼之”。陈氏认为“亦不尽然。夫守必据险，海口有险则守海口，内河有险则守内河，……且以吾粤言之，猎德大黄滘地势平衍（指内河）孰如虎门险峻乎？（指海口）”放弃了海口的守卫，正如后来琦善拆卸虎门炮台，敌人求之不得，海口不守，内河立即陷落——陈与魏的见解不同，陈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魏多从书本体会有一些主观臆见。陈氏将此见解函复张南山。并有附记云：

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①

以上各节，仅举例而言，不能概括陈澧的学术贡献之全貌。但可以看出，他能够从乾嘉以来的汉学、宋学牢笼中脱离出来，走向经世致用的道路。

六

陈澧的这部手稿，当时未能刊行，就他所发表过的其它著作以及身后流传并非全稿的《东塾读书记》看，与他批评时弊的主张，也只是“引而不发”，可能他本人以及校刻著述的门人，对清代文网，还有余悸。今天看来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正如前文引证杨寿昌、梁启超等人对陈氏的评价，认为还有借鉴的价值。就清代学术史、尤其是近代史方面，这部《著稿》提供丰富的材料。再就祖国科学技术史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它不但对清代的汉学、宋学之争议有详尽评述，也对历代的文字学、历史学、文学史、地理学和历算乐律等多方面理出了头绪。至于他胸怀大志，想通过学术的讨论，达到转移风气的要求，看来似乎迂

①《东塾集》卷二。

调；但这在当时，是从实际出发的通达见解。因此，像魏源和许多学者，对于陈氏给他们坦率的批评，能够虚心接受。总之，陈澧不但是清代后期广东省卓有造诣的学者，也是我国近代史上开新风气的人物。

对这部《著稿》应该怎样进行整理公之于世呢？我们提出初步的意见如下：

一、为了保持原著的本来面目，前岭南大学陈受颐教授曾发表过一部分遗稿，按原书不改动一字，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何况原稿已经著者自行作过朱墨批改，即照原稿和原批改的影印或排印，便于阅读及研究陈澧学术的人，能体会著者原义。

二、既然了解到前岭南大学图书馆收存有抄本六百余小册，拟再访寻。如能访到，与这部《著稿》对校，还可能补充若干篇目。如果岭南本访不到，再向各省征寻其它传抄本及刻印本，也作为校印此书的参考资料。

三、关于陈氏生平，当另编“年谱”，其著述无论已发表或未发表过的均编写详目及提要。对陈氏学术思想的研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分别专题另写文章，不与原著相混淆。至于杨寿昌氏的二十三个专题摘录原文并加按语，仅供参考，也不属原著的一部分。

云南省图书馆所发现和保存的这部书，可算是重要文献。我们仅就了解到的资料，写此考评，以求教于同志们！

附 录

（一）《东塾著稿》暂编总目及册次

学思录序言 杂论学术 （第一至二册）

易书诗 （第三至五册）

曲礼 仪礼 （第六册）
礼记注疏 小学释文 （第七至十册）
三礼 孝经 论语 孟子 （第十一至十二册）
音韵 反切 （第十三至十六册）
读后汉纪 （第十七册）
晋至隋诸史 （第十八至三十九册）
唐书 （第四十至四十八册）
宋史 （第四十九至七十一册）
诸经诸儒通论 论史 （第七十二至七十四册）
孔门诸儒 （第七十五至七十六册）
家语 （第七十七至七十九册）
汉魏晋南北朝儒学 （第八十至八十九册）
唐疏 近儒 （第九十至九十一册）
北宋 （第九十二册）
宋儒 宋学 （第九十三至九十五册）
宋明儒 （第九十六至一百册）
本朝诸儒（第百零一至百零三册）
诸子 （第百零四至百零九册）
郑君 虞翻 六天 纬书 王肃 （第百一零至百一一册）
九流 佛 （第百一二至百一三册）
世说新语 （第百一四至百一六册）
楚辞 （第百一七至百一九册）
陶集 （第百二零至百二一册）
尹河南集 （第百二二册）
柳仲涂集 （第百二三至百二四册）
亭林集 汤子遗书 白田存稿 （第百二五至百二六册）
复初斋集 （第百二七至百二八册）
总论 天文 地理 论史 论文 举业 （第百二九册）
通论 （第百三十至百三五册）
默记 （第百三六至百三九册）
论学 （第百四零至百四一册）
学思自记 （第百四二至百四三册）

著书 抄书 文章 (第百四四册)

杂文稿 (第百四五册)

琐记 (第百四六至百五零册)

以上编目，前段参照经史子集四部类目，后段则以“总论、通论”列于先，继之以“论学”等专题以讫“琐记”。其中有几种与类例歧出的，如“小学释文”夹在“礼记注疏”与“三礼”之间，“近儒”杂于“唐疏”与“北宋”之间等；由于作者原题各册封面如此，装修者即据以合订。既然是稿本，即不拆开另装，以保持本来面目。

(二)《东塾著稿》写作年代与陈澧有关事项简表

嘉庆十五年庚午(公元1810年) 陈澧生于广东省番禺县。

咸丰七年丁巳(1857) 陈澧四十八岁，始作《学思录》。是年腊月，写成“复初斋集笔记”。

八年戊午(1858) 四十九岁 编刻《汉儒通义》七卷成书。开始辑抄“宋明儒杂录”。

九年己未(1859) 五十岁 写“学思录序言”及“杂论学术”、“六天纬书”，汇订“宋明儒杂录”成册。

十年庚申(1860) 五十一岁 刻《声律通考》十卷成书，汇订“易、书、诗、汉魏六朝儒学”，续订“宋明儒笔记”。

十一年辛酉(1861) 五十二岁 开始写“孔门儒家”及“汉儒郑王学、宋儒”，汇订“默记”、“记学”及“著书、抄书、文章”，并编订“本朝诸儒”及“诸子”。

同治元年壬戌(1862) 五十三岁 续编“易、书、诗”，续写“郑王学、唐疏、近儒”，并汇订“学思录通论”、“学思自记”、“宋儒”、“九流、佛”及“己未以前所记诸子稿”。

二年癸亥（1863） 五十四岁 刻《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成书。四月，写“学思录总论”，十月写“楚辞笔记”。

四年乙丑（1865） 五十六岁 开始写“家语笔记”。

六年丁卯（1867） 五十八岁 五月，开始写“后汉纪”。

八年己巳（1869） 六十岁 十一月写“读柳仲涂集”。

九年庚午（1870） 六十一岁 四月写“读河南集”。

十年辛未（1871） 六十二岁 大病几死，撰“自述”。

十一年壬申（1872） 六十三岁 六月汇订“三礼、孝经、论孟”及“学思录通论”。秋冬订“杂文稿”。

光绪元年乙亥（1875） 六十六岁 七月十六日开始写“晋至隋诸史笔记”。

六年庚辰（1880） 七十一岁 十月写“礼记注疏、小学释文”。

八年壬午（1882） 七十三岁 正月二十二日逝世。

陈澧逝世后，门人廖廷相就遗著《东塾读书记》得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余未成。

以上仅就《著稿》批有年代的编列以供参证。其它事项也只摘录有关的几件事作对照。至于《著稿》省略的年代和陈澧的毕生经历与著作详目内容提要，我们将另编《陈澧年谱》详叙其事，这里不备录。

